

# 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

——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

李述森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 要]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生都致力于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纯洁性。19 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民粹派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大行其道。为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对持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俄国民粹派在政治上给予大力支持,较少公开批评其理论观点。于是,一些论者便认为马克思晚年基本认同了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极为不正确的一种看法。马克思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中,是始终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当他感到自己的理论观点有可能被人们作出趋近于民粹派理论的理解时,就坚决予以舍弃。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为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对待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关键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俄国民粹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3)08-0141-09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3.08.017

学界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很大程度地认同了俄国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观点。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三份俄国问题文献——《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主要是草稿)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终生为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俄国民粹派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奉者,极力主张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晚年真的会放弃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而认同俄国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吗?详尽考察马克思的三份俄国问题文献,我们将作出否定性的回答。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晚年尽管在政治上非常看重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较少公开批评他们的理论观点,但也完全没有为了政治上的考量而公开认同他们的理论。

## 一、《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与马克思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马克思 1870 年代中期以后论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首篇重要文献。通过对它的考察分析,我们会非常明显地感受到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底线的坚守。马克思的这种坚守既体现在信的主要内容中,更体现在他对该信的最终处理上。

1872 年上半年,《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堡出版。1877 年 9—10 月,俄国思想界就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自由派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一

[作者简介]李述森(1963—),男,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书》,激烈攻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理论与方法,而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则发表《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为《资本论》进行辩护。然而,在辩护的过程中,米海洛夫斯基也对《资本论》中某些论述产生了疑问乃至曲解。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原始积累”一章中马克思曾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sup>①</sup>“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sup>②</sup>米海洛夫斯基从中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形成阶段的历史特征,但给出的却是整个历史哲学理论;按照这一历史哲学理论,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包括俄国在内都将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一个注释增补材料里,还有这样一段关于俄国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赫尔岑的批评性插语:鉴于欧洲大陆上存在着由资本主义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赫尔岑曾非常认真地预言,欧洲也许最终不得不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米海洛夫斯基于是又从这个插语中得出结论说,单单从这样的语气中就不难判断出马克思对于那些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走过的、并且仍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俄国人所做的努力的看法。

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上述两处曲解使马克思非常气愤。因为这样的曲解有可能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马克思同俄国自由派一样,是主张俄国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由此也就将马克思置于了同俄国民粹派相对立的地位。而马克思由于非常看重俄国民粹派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将他们视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者,一直与他们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因而并不想公开否定他们探索自己国家独特发展道路的努力。因此,马克思迅即写了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对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观点的曲解进行澄清。

马克思在信中首先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中那段关于赫尔岑的批评性插语的曲解。马克思指出,他在那段插语中责难赫尔岑的,主要是其将俄国公社看作是拯救腐朽的西方的良方的这种泛斯拉夫主义观点,而决不能从中引申出自己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因为在那段插语中根本就没涉及这样的问题。米海洛夫斯基为什么要把自己对赫尔岑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倾向的批判看作是对俄国人探索自己国家独特发展道路的努力的否定呢?

不过,在作了这样的解释之后,马克思也立即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另一种误解,即认为他是只反对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而不反对其民粹主义观点的,甚至是赞成赫尔岑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如果不对此加以澄清,就有弱化甚至是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之嫌。马克思当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于是,又举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例子来进行阐明。

马克思写道,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在谈到关于约翰·穆勒经济学说体系的特征及其历史评价时曾指出“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sup>③</sup>这段话无疑体现出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高度尊重。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国民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还在自己几篇出色的文章中谈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sup>④</sup>。马克思进而反问米海洛夫斯基道,你既然可以根据我对赫尔岑泛斯拉夫主义倾向的讥讽断定我反对俄国人探索自己国家独特发展道路的努力,那么你也应该根据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3页,第874页,第17-1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而得出我赞成他所赞同的那个观点的结论,虽然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只是就其对经济学的贡献而言的。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里表明的是,他并没有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个观点,不能将不同语境中的问题混为一谈。只不过,他在这里用的表达方式是有些婉转的。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借此就将自己的观点与民粹派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区别开来,从而保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底线。

在对《资本论》中关于赫尔岑的那段批评性插语作了澄清以后,马克思又回过头来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不能将其《资本论》中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理解为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的问题。他引用的不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的论述,而是经过修改后的1875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的有关段落,即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sup>①</sup>较之于德文第一版,这里的“其他一切国家”前面出现了“西欧”这一限制词。马克思继续写道,在“原始积累”一章的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强调说,在这里我没有进行任何论证,因为这只不过是对前面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归纳而已。

概括而言,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论述只是介绍西欧各国的情况,没有涉及西欧以外的国家;二是自己在《资本论》的“原始积累”一章中没有提出所谓理论。毫无疑问,这后一层意思通常不会产生歧义,但前一层意思则有被人们作出其他解释的可能,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只能在西方产生,俄国等落后国家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这无疑有趋近于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之嫌。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马克思紧接着又补充了这样一段话:人们可以将我的这种历史概述中的哪些内容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循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sup>②</sup>在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告诉人们,俄国是可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他并没有仅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可能性限于西欧各国。这就与民粹派理论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紧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既是给我的荣誉,也是对我的侮辱<sup>③</sup>。他还列举了古罗马平民在古时的命运,然后强调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sup>④</sup>。多年来,人们常常将这些话看作是马克思具有与俄国民粹派相近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重要依据,不时加以引证。然而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在西欧以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充其量是持一种中性的立场,因为他反复强调说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这与俄国民粹派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更进一步说,马克思在这里更多强调的是方法论这一抽象的问题,而并没有将重心放在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上。

最后,关于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是否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底线,我们还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在信的第一部分中,在评论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后作出的那个“结论”。因为,认为马克思在信中认同了民粹派观点的人们,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马克思的那个“结论”。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经过对俄国各种各样资料的详尽研究,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sup>⑤</sup>

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也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首先,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马克思无疑是为着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划清界限的。因为如上所述,马克思不赞同车尔尼

<sup>①②③④⑤</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第145页,第145页,第145页,第143页。

雪夫斯基的那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强调自己对俄国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就是要表明后面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照搬的别人的,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其次,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里,马克思也没有给出一个肯定性的结论。他用的是假定句式,而这个假定却又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如何能够中断业已开始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呢?马克思没有作出任何的阐释。而什么是历史提供给俄罗斯民族的最好机会,也完全没有交代。当然,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无疑包含着希望俄国不再继续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倾向。这可以说是比较趋近于民粹派立场的一种表达。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能说是为了软化自己与俄国民粹派相对立的立场。但这样一来,就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底线。马克思还是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尽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体例完整,篇幅适当,对主要问题也已经阐释清楚,但因为有这样的“瑕疵”,马克思最终还是放弃了将其寄出去发表的打算。也就是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实际上是被马克思最终废弃了的文献,这一点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与民粹派的关系、马克思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等问题,绝对不能忽视的。

## 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与马克思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

较之《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是更为直接地阐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农村公社发展前景问题的。马克思对这封信的构思和处理过程非常复杂,最终也没有给查苏利奇一个十分明确的答复。详尽研究这封信,更能体会出马克思是如何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

1880年,俄国民粹派思想家沃龙佐夫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在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有关理论的争论。1881年2月16日,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代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致信马克思,请求他解答令他们疑惑的问题。

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主要包含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介绍了《资本论》在俄国受欢迎的情况及其在俄国关于农村公社命运和资本主义问题争论中所起的作用,说俄国很大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都在阅读它,还有一部分人在认真地研究它。其二,指出在俄国经常听到一种意见,农村公社已经是一种陈旧腐朽的东西,从历史规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它难逃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宣扬这样一种观点的人,都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其三,请求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命运和俄国是否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其四,指出这些问题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生死攸关,希望马克思给予详尽阐述,并允许将其意见公开发表。

收到查苏利奇的来信后,马克思非常重视,不顾手头事务众多和年迈体衰,立即着手写作复信。在此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马克思先后写下了四个草稿,一万几千字的内容,但最后寄出的复信却十分简短,与查苏利奇的请求相差很远。

马克思复信的初稿文字最多,主要阐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论述作出说明。马克思引用《资本论》法文版中的有关文字指出,资本主义起源“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sup>①</sup>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在西方的运动中是一种私有制形式被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取代,而在俄国,土地从来没有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怎么能应用这一论述来加以说明呢?其二,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的特点,尤其是优点,主要有:(1)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和劳动组合传统有利于俄国农民转向集体耕作。(2)农村公社兼具公有和私有两种属性,一方面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会有两种发展前途,是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页。

因素还是相反,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3)农村公社具有孤立性和软弱性的缺点,但通过发展自治的方式很容易将其消除。其三,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利外部环境。主要是两点:(1)它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时代的东西,因此,可以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积极成果。(2)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面临着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前景,因此,俄国农村公社不必自杀就能够获得新的生命。

不过,对于以上内容,马克思又在信稿的后半部分强调说,这是从纯理论上讲的,而回到现实中来,则是农村公社处于危机之中,有随时被扼杀的危险。俄国农村公社的危机主要表现在:(1)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开始,国家就不断借助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各种力量压迫公社。(2)国家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潜在的各种利益冲突,加速了公社的瓦解。(3)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力,却特别有助于非生产者窃取它的果实。凡此种情况表明,要使俄国公社免于灭亡,就必须发生俄国革命。一旦发生这种革命,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

初稿之后,马克思又很快写了二稿。二稿的开头部分同初稿一样,也是关于如何理解《资本论》中有关论述问题的。其他内容则有增有减。增的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减的则是没有再明确提及俄国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只是问道,农村公社在受到国家、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等压迫和破坏的情况下,何以继续存在下去呢?但总的来说,二稿的篇幅和字数较之初稿是大大减少了。复信的三稿较之二稿文字又稍多,但涉及的内容却大幅减少。并且,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马克思在其中写上了台头语,表明是想将其作为正式复信的。马克思在台头语中写道:我希望写的这一简短的说明,能足以消除您对所谓我的理论的一切误解。这表明马克思只是想将目标设定在消除查苏利奇对其《资本论》中所作论述的误解上的。马克思在信的开头的确保留了前两稿中所提及的关于《资本论》的那部分内容。但是,马克思在三稿中没有再提及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中、俄国革命和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而是又加上了关于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与经济合理性相矛盾这样的说法,随后又说这将有助于向集体耕作过渡。之后,信稿就突然中断了。就是说,三稿是一份远没有写完的书信。

三稿之后还有一个四稿。然而,四稿内容与前三稿相比断崖式地减少了:总共只有300字左右,前三稿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被舍弃了。四稿中的台头语较三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为“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sup>①</sup>只是希望用寥寥数语消除查苏利奇因误解自己所谓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

接下来,马克思在四稿中只写了这样两段话:一是,在《资本论》中既不存在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存在否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内容。二是,通过对俄国各种原始材料的专门研究,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能够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消除各方面对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前一段话撇清了《资本论》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关系,后一段话则作出了一个简单的、假设性的结论,并且,在这个假设性的结论里,农村公社也只是被赋予了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的作用。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前三稿中皆提及的关于《资本论》的阐述消失不见了。在四稿写就的同一天,马克思最终写成了定稿。而这个定稿只是在四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前三稿中皆有的关于《资本论》的那段论述。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到第四稿和定稿时,马克思已舍弃了前三稿中所包含的大部分内容,并且还断然说不能给查苏利奇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通过与查苏利奇来信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最后基本放了解答查苏利奇之问的尝试。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论述方式不能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相协调,或者说,它过于趋近于民粹派的理论观点了。

那么,马克思最初为什么要采取上述那种论述方式呢?这与马克思当时的政治考量以及查苏利奇之问的性质密切相关。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在给查苏利奇复信前的时期,有两件大事影响着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立场。一是德国的局势。在整个18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急剧扩大,大有战胜资产阶级政党之势。然而,1878年10月,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专制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工人阶级政党受到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这大大激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情绪,他们迫切希望在德国以及在俄国发生摧毁专制政府的革命。二是1879年秋,俄国民粹派运动发生分裂,主张通过恐怖活动反抗专制政府的民意党成立,俄国的恐怖活动随之增多起来。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关注,他们非常支持民意党人的这种行动。恩格斯就在1879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俄国,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运动正在成熟。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俄国的政治性谋杀就是聪明、有个性和有自尊心的人们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闻的专制制度走狗的唯一手段。”<sup>①</sup>

到1880年,马克思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年10月,俄国社会革命党执行委员会致信马克思,向其表达了崇敬之情和坚决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决心。马克思随后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表达了对在国外的俄国宣传派的厌恶和对在俄国国内的革命派的赞扬,说在俄国,“我们一方面有批评家……,另一方面有恐怖主义者的中央委员会,它最近在彼得堡秘密印发的纲领引起了在日内瓦出版《土地平分》的旅居瑞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和冒生命危险的恐怖主义者相反,组成了所谓的宣传派(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sup>②</sup>

还需注意到,查苏利奇本人的身份和求教方式,也影响到了马克思最初的思路。查苏利奇是俄国著名的女革命家,1878年时曾因刺杀沙皇政府高级官员而被捕,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沙皇政府释放,被迫流亡国外。她是俄国革命的良心和不屈不挠的象征,对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崇敬,致力于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她向马克思求教的,也是俄国革命党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得到的是俄国农村公社没有前途和俄国必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回答,他们就将失去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动力。

凡此种种,都使得马克思在最初构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时,须最大限度地迎合俄国革命者对农村公社的信仰:一方面,要否定自由派关于俄国必须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另一方面,要对农村公社的作用和俄国以其为基础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给予较多的肯定。于是我们看到,在几个草稿中,马克思不再强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以西方革命率先胜利为前提,而是说因为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时代,它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还从农村公社自身的角度、从世界资本主义已陷入危机的角度对其观点进行强化与佐证。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俄国革命自身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没有超出民粹派理论的范畴。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就主张俄国应该引进资本主义大工业以改造农村公社,他们只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和就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说法,也和民粹派固有的观念相一致。并且,俄国革命也是民粹派一直追求的,他们不仅宣传革命,而且还主张立即进行革命。

然而马克思毕竟是马克思,他在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约束。对他而言,无论政治上的诉求多么重要和强烈,也绝不能损害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指导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理论旗帜。于是,我们看到,在复信写作过程中,当马克思发现自己遵循的思路和阐述的内容不能坚决与民粹派理论划清界限时,他就开始退却了,最后将与对农村公社优越性论证有关的内容一概删除,并且完全撇清了《资本论》与农村公社问题的关系。

只是,马克思不能对查苏利奇等俄国革命者最关心的农村公社问题完全不作答复。于是,在定稿中,在首先声明其回信不适合公开发表的情况下,马克思最后还是写上了四稿提到的那个“深信”。但是,我们也须注意到两个情况,它们都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相关的。一是,马克思在这里,同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类似,用的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

<sup>①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第343页。

深信……”<sup>①</sup>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他还是强调自己的看法是在没有受到民粹派影响的情况下作出的,从而与民粹派观点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二是,马克思在这里赋予农村公社的只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的作用,亦即杠杆性的作用,表明农村公社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从马克思这个“深信”的整体来看,重心显然是放在鼓励俄国革命上,而非解答农村公社本身的前途命运上。

在学界,多数人很少去区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之间、草稿与正稿之间的差异,而是倾向于将它们混同看待与阐释。更有少数人否认这些信稿之间的差异,回避马克思复信写作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竭力证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更不愿意谈及这是马克思不愿意公之于世的一份信稿。究其原因,就是不理解马克思始终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民粹派理论之间进行权衡,并且最终要守住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底线。

### 三、从《〈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看马克思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问题唯一作出公开表态的文献。详尽考察这一文献,我们同样能看出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捍卫与坚守。

1882年初,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准备出版《社会革命丛书》,拟把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首批重要文献列入其中。为此,编委会委托民粹派资深革命家拉甫罗夫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希望他们能为这一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一篇序言。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想知道的是,在30多年后的今天,两位革命导师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该宣言的。马克思、恩格斯欣然答应了俄国革命者的请求,很快写好了序言并寄给了他们。俄国革命党人也在收到序言后很快将其出版发表。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篇幅不大,前半部分主要是对《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回顾,特别是强调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以及俄国革命运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1848年前后,加入到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来的地区是那么的狭小,甚至都没有包括幅员辽阔的美国和俄国。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俄国甚至还不存在大工业。它们作为农业国一方面向欧洲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又是它重要的工业品销售市场,从而在客观上构成了欧洲旧秩序的重要支柱。然而,到了1880年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使得美国能够大规模地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增强竞争力,从而摧毁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与此相联系,美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发展壮大起来了。那么,俄国的情况又怎样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1848年革命期间,整个欧洲的统治阶级都还指望依靠俄国的干涉来镇压刚刚觉醒的无产阶级,俄国沙皇被置于了欧洲反动势力首领的地位,但是现在,俄国沙皇在革命党人的追击下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而俄国也已经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是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和高度看待问题的。因为首先,它用不少的篇幅谈了美国。为什么要谈到美国呢?因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30余年里,世界格局发生的一个最重大变化,就是居于美洲大陆的美国迅速崛起了。它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国。这自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世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受到镇压。要打击英国的资产阶级,就必须首先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而美国工业的崛起和强大的竞争力,则必然导致英国工业的衰落。另一方面,美国工业的发展也催生了自身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随着美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它必然要积极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益,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由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和规模就更加扩大了。

继美国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论及了俄国,但角度与对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大工业及相应的工人阶级运动,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撼动英国的垄断地位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以自身的工人运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贡献。但是,俄国由于有自己特殊的角色和地位,也被马克思、恩格斯视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国的这个特殊角色和地位在于,自1848年革命起,只要近旁还存在着俄罗斯帝国,欧洲革命运动就难以获得成功。因此,要推进欧洲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摧毁沙皇专制制度;而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其内部引发动荡与革命,虽然这个革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中有过明确的阐述。

然而,如何才能在内俄国内部引发革命呢?在当时的俄国,只有信仰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民粹派是唯一重要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民意党人,不断进行恐怖暗杀活动,甚至在1881年3月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极大地震慑了沙皇政府乃至国际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sup>①</sup>

在序言的后半部分里,马克思、恩格斯又谈及了俄国革命者长久以来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即俄国能否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发展,大部分土地还是归农村公社公共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已经受到一定破坏的俄国公社是会像俄国民粹派认为的那样,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呢?还是相反,它必需先经历一个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的一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大段话,从直观的角度看,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共产党宣言》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有一定的错位性。因为,《共产党宣言》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而当时的俄国,整体上还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农村公社土地占有制还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呢?由此就引出了俄国革命党人一直关心的那个农村公社的前景问题。其二,俄国社会和农村公社基于自身的条件是不可能与共产主义有啥关系的,但是,俄国如果能发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这一革命又能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它们相互补充,那么俄国农村公社中的土地公有制还是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这是目前唯一可能的答案,没有第二种答案。

当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大段话,我们还有必要从更深层的意涵上来作出分析。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的理解着重点,主要放在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为其规定了必要的条件而已。而只要这两个条件具备了,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和新生就可以实现。并且还认为,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这两个条件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俄国基于自身条件的不可跨越性,而非将重心放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上;而强调西方革命重要性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突出物质条件、生产力条件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性。这就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基础上来了。

还需要补充强调的是,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提到的俄国革命的作用问题不应估计过高。马克思、恩格斯赋予它的仅仅是西方革命信号的作用,而即使这样,也更多是从鼓励的意义上讲的。至于俄国能否发生这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作过严格的分析。俄国的确可以发生社会革命党人的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第8页。



恐怖活动,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民粹派的恐怖活动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也难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例如,俄国革命党人在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就立即被残酷镇压,再也难以掀起恐怖活动的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缺少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赋予其较高的地位。其次,俄国即使发生了恐怖活动,也难以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起到信号作用。因为西方革命不能发生和获得胜利的原因,并非主要是因为沙皇俄国的存在。一来,当时的俄国国力衰微、政治上极为脆弱,在国际政治中处于守势,已难以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二来,西方革命运动难以发生的原因主要还是在西欧社会自身。当时的西欧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之中,生产力迅猛发展,政治制度得到一定的调整,无产阶级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政党诉诸选举等手段发挥一定的作用。劳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中,作了详尽的阐述。既然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都难以发生,那么将它们作为俄国在农村公社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主要目的显然就不在于这一过渡本身了。

马克思、恩格斯公开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文献主要有三个。除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外,另外两个就是恩格斯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1894年为其作的跋。仔细研究《〈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我们会发现,它与恩格斯的那两个文献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恩格斯那两个文献的核心要义,就是坚决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批判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在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还特别谈到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俄国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言里说过了。”<sup>①</sup>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过于纠缠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补充的含义以及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三份涉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文献中,都体现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和捍卫。政治上的考量有时可能会对其正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造成一些干扰,但在最后时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总是会占上风。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和捍卫为我们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树立了榜样。

[责任编辑:韩小凤]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Dao leads to virtue ,” while Zhuangzi talks about “morality.” This constitutes the metaphysics or ontology of “Dao-De” in Daoism. Understanding this “Dao-De” ontology in Daoism is of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importance for grasping the concept of the “Dao” and exploring the profound philosophy of Daoism.

### **How the third distribution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untryside: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Qu Yanchun* 122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 the most arduous and heaviest task li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third distribu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untryside , and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building a coordinated system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 redistribution and the third distribution. Although rural area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arget area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 such as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voluntary services , there are also obvious problems. In terms of total quantity , the number of rural charitable donation resources is limited. In terms of structural dimensions , the short of farmers’ spiritual life prosperity is prominent. In terms of motivation , the power of rural volunteer service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is weak. Although the third distribution relies on “voluntary” actions , such “voluntary” actions also need certain institutional design to stimulate i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third distribution ,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charity don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to expand rural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able resources , establish the spiritual life prosperity promotion mechanism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ural prosperity , shape the voluntary service growth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motiva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 and strengthen the leading mechanism of charity culture to optimize the rural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able environment.

### **Marx’s adherence to the bottom lin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y in his study on Russian issues**

——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ree classical documents

*Li Shusen* 141

Marx , the founder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 committed his whole life to upholding the purity of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Rus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 the theory of Utopian socialism of the Narodniks peasants became popula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world socialist cause , Marx gave strong political support to the Russian Narodniks who held the view of farmers’ Utopian socialism , and less criticized their theoretical views publicly. For this reason , some theorists believe that Marx basically agreed with the theory of Utopian socialism of Russian nationalists in his later years. This is a highly incorrect view. Through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Marx’s three documents on Russian issues , this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Marx always sticks to the theoretical bottom lin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his thinking about the road of Russian social development. When he felt that his theoretical views might be understood as Narodniks theories , he resolutely abandoned them. Marx’s adherence to the theoretical bottom lin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has set a brilliant example for us to correctly treat and apply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practice.

### **Reverse thinking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 judicial judgment**

——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judgment mode of “making crimes by punishment”

*Wang Bin* 163

In the judgment of difficult cases , the reverse judgment thinking mode of selecting judgment reasons based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judgment is often more effective. However , this judgment mode has been criticized by legalists due to the risk of illegal judgment. In criminal adjudication , the concept of “making crimes by punishment” as a reverse judgment thinking includes three links: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law , predi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djudication ,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conclusion of adjudication. Through these three links , the judicial mode of “making crimes by punishment” has realized the unity of legal stability and judicial appropriateness.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escriptive consequentialism and normative consequentialism in terms of research stance , and incorporate reverse judgment thinking into the framework of legal doctrine for verification based on normative stance.